

中国现代革命史

学习参考资料

第 2 辑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中山大学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室編

中國現代革命史学习参攷資料

第二輯

(中國共产党創立时期)

—目 录—

由封建的中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	陈伯达	1
帝國主义对中國的侵略	胡 繩	15
——一九一九年以前资本主义——帝國主义侵略中國的历史研究提綱		
紀念太平天國百周年	人民日报社論	26
中國工业与中國資产阶级	陈伯达	31
紀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		
家——孙中山	人民日报社論	58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会上的讲话	董必武	62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國革命	陈伯达	67
中国的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鄭 拓	73
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	陈伯达	87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	于 晋	94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与		
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109

— 附 录 —

列宁论中国和中国革命（译文）	尼吉霍雅夫	124
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	汪子嵩等	146
‘学者’——政治阴谋家	张 沛	163
——胡适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反动本质		

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近代中国经济杂说之一)

陈伯達

在东亚的大陆上，有一个国度，它的人口佔至地球的约四分之一，它的历史是世界文明开始的最早国度之一，这个国度就是中国。这个国度经历过数千年的长期封建社会，虽则这国度中各族人的足跡，如汉族人的足跡在很早时候就曾经西至波斯湾，东至日本，北至西北利亚，南至印度和锡兰，蒙古人的足跡且走得更远；但这个国度在大体上还是闭关自守的国度，这点是由它的长期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结合是这长期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农村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天地，不论在农业上或手工业上经营方法的特色「祖传」和「秘制」。从一定程度上说来，这在其他各国封建社会的情况也有差不多的同样情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生产方式就这样说过了的：「旧的生产方式的保守不变，曾经是一切过去产业阶级生存的第一个条件。生产的继续的革命，一切的社会关系的不断的动盪，永远的不安与运动，是有产者时代与以前一切时代不同的特色，」在那种旧的生产方式中，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分工，所谓「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左昭二十六年，齐晏子）祖孙父子世襲了一种同样的工作。

祖传与秘制既然是旧生产方法的特色，所以，社会上就流行了关于各种守旧的习惯，崇拜各种古董。人们养成一种食古不化意识：祖传，祖传的就是好的，非祖传的就是不好的。在各种的机遇上，对于各种东西，人们就总要自称是祖传的正宗。各个独立生产者是以祖传和秘制为光荣而傲人，并用来压倒对方的。多少「王麻子」的剪刀舖，都自称是真正祖传的「王麻子」企图取得自己是王麻子正宗的招牌。一直到现在北平还有一个肉食舖自称他的肉湯是以明朝传下来的，因为这样「数百年祖传」的肉湯，

门市就特别兴盛。工农业品、职业、政治制度、社会规矩（礼教）、学问、宗教、甚至血统关系，人们都要自称是祖传的正宗，以求得到社会的尊重。

近代中国不少资产阶级学者喋舌不休地争论：所谓「东方文明是静的，西方文明是动的。」这种抽象的争论当然会流于愚蠢的争论。但是要为不落于愚蠢，而以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比较说来，那末，也即可以那样说，因为东方本来处在封建生产方式的情况中，所以，其「文明」就表现是「静」的；而西方则早已是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所以，其「文明」就表现是「动」的。

忽视中国旧封建社会的保守这一方面，否认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有过「停滞状态」这是忽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具体的特点，也是否认了马克思根据历史分析早已提出的观点。但是却不能由此得到一种奇怪的结论说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是绝对不变与不动，夸大相对为绝对，这是荒谬的。这就会走到否认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中国历史变成神秘的偶像，像一般顽固的国粹论者所做的。

自从春秋战国以后，社会分工已有某种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了「百工」的发展，便也会有交易的发展（孟子：「以百工交易」）。固然，这是不可夸大的，而且也有倒退的时候（特别如大家公认的南北朝中的南北朝）。由于手工业「百工」的发展，就出现了某种手工业的协作以至某种手工业的工场。而远在唐代，甚至已发展了某种机械的制造（如旧唐书李鼎传所载：李鼎……常运用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宋史岳飞传载，洞庭湖中的湖匪，曾使用轮船「以轮激水，其行如飞」。——参考钱亦石：（「近代中国经济史」）。明时景德镇的瓷业。系当时一个法国传道师曾这样描写过：「景德镇者，周围十方里之大工业地也，人口近百万窑约三千，晝间白烟掩盖大

空，夜则红焰烧天」（转引自吴仁敬章安潮「中国陶瓷史」五一页）。清代工场手工业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些简单的例子，正表现了封建社会之一般必然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里面产生的，是在封建社会的腹内生长和成熟起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不管其如何表现为停滞状态的，然而总是一步一步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向接近。

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发展动力的，是农民、城市贫民及手工业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在二千余年中几乎每二百年左右为一週期即形成一次全国性的农业大饥荒，而在这大饥荒的基础上，即点燃了一次全国性的大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每当这时候，社会各阶级都捲进于这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漩涡。每次农民战争虽则由于缺乏城市革命阶级的领导而陷于失败，然而其结果是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迫得他们要做些让步，使农民其他独立生产者得稍为「休养生息」，这就是成为社会生产力更往前发展的一个出发点。中国旧时历史上所谓「一治一乱」，或如三国演义上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事实上就是反映了上述的规律的。清末维新派的历史家夏曾佑所著「中国古代史」曾说：「中国历史有一公例，大约太平之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后四五十年，从此之后，盛隆约可及百年，百年之后，又有乱象又齟齬数十年，遂致大乱，复成革命之局，汉唐宋明，其例一也。而其间偶有参差者，皆具特别之原因，无无故者……」。夏氏看出这规律的一定现象出来，当然是一种发现，然而他却不能具体把握这规律的本身。历来把农民革命看成「叛乱」，这本是统治者的偏见，可是农民对于旧统治者的叛乱，也畢竟是最大的荣禄，没有这种「叛乱」是没有中国历史上的光明的。

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按照它自己运动的规律，是可能在一定的日子「突变」为资本主义发生的，即使没有西方人的影响，中

国总有一天由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是它还在走着骆驼式的慢步时，西方人就赶到他的前面，中国人就被抛落到后面了。和在十六、七世纪以来的西方人比较起来，中国人真落后了。中国还以「唯我独尊」的上国自居，然而西洋人大踏步的叩关而进，中国的腐败毕竟抵抗不住了，藩篱被折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底迅速的改善，由于交通工具底无穷的更加容易，就把一切人民连那最野蛮的也在内，都捲入文明里面来了。它那商品低廉价格，是它的至宝，它用这种轰倒一切中国的城墙，用这个克服野蛮人对于异族的最顽强的仇恨，它强迫一切民族在毁灭的威胁之下，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它强迫它们输入所谓文明到它们里面去，就是说，变为资产阶级的。一句话，他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一个世界。」

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自己运动可能走到资本主义，这观点是错误的，同时，如否认近代中国的出现资本主义是欧美西风波反的结果，这观点也是错误的。

自然，中国旧生产方法的抵抗仍然是有力量的。小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这个在经济上祖传的家风，对于外来资本主义商品的抵抗，仍然会表现出其一定的作用来，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曾引用了英国人一些报告，来证明了这点。把这些材料在这里转引出来，对于中国旧经济的了解，是很有趣味的。关于中国人「宁愿穿着父亲和祖父的服装」这事实，马克思引了如下的一個报告：

「中国人的生活如此俭朴、如此守旧，以致他们穿着他们祖先穿过的衣服，就是说他们所用的只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其余概不需要……每个中国劳动者的衣服至少要穿三年，不上三年不换新衣，而且这套衣服，虽做极粗糙的工作也

能穿三年。因此这种衣服所需的棉花，比我们输到中国去的最重要的棉织品所需要的棉花至少要重两倍，换句话说，这种材料要比我们可以运到中国去赚钱的最要的厚布还要两倍。穿父亲和祖先的衣服，或者一件衣服至少穿三年，或者一件衣服穿一辈子，这在二、三十岁的中国人中，也还是一件并不惊奇的事情，而且一直到现在，在不少地方，也还是不足为奇的。这种土布的坚固，可以从其洗衣的方法看出来，中国旧时洗衣，都是叫做拷衣，而且是放在石头上拷的，虽则是这样，仍然没有妨害它们的耐用，这种土布大部本来就是农家自己家庭的产品。这里可再引马克思所引过的那个英国人的报告：

「收穫完结的时候，各农家的一切工作人，小的老的都去梳理棉花、纺纱、织布，这种家庭制造的，笨笨而结实的、能够经受两三年内粗糙穿用的土布，中国人就用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把剩余的土布舒到城里去出卖，城市商贩就购买这种剩余土布去供给城市居民及内河船夫的需要，……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是在中国可以看到每个富裕的农家都有一架织车，这是值得注意的。在其他各国，人们只限于梳理棉花和纺纱的工作，它们的生产过程到这里为止，把它们纺成的纱交给织匠去织成布匹，只有富裕中国人，才一定要把一切手续做到底。中国人不仅要梳理棉花和纺成棉纱，而且还与自己老婆和女儿以及家庭女工一起织成布匹；它的生产不仅只为自己家庭的需要，而且其一部分的工作时间是用来生产一定量的布匹去供给邻城和内河居民的。」

「例如福建的农民不仅是一个农民而已，他又是种田人，又是小手工业者，他生产布匹简直不费分文的（如果原料的价值不算在内）。他在自己农庄屋子里面用自己的妻女和女工的手制成布匹；这种土布的制成不费特别的劳力，也不费特别的时间。在田亩未熟的时候在收穫完结之后，在天雨

不能出外操作的时候，他就使农庄的工人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当中只要有些空闲的时候，这个家庭勤劳的模范人物便从事生产什么有益的东西。」

这种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妨碍了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的贸易，不过，这种抵抗是很有条件的。机器大工业大生产之产物的特色，是大量而精巧；因为机器的生产是大量，所以是廉价的；因为机器的生产是精巧，所以是物美的。这种价廉物美的商品，终究不是小生产的农家副产物或手工工场的产物所能匹敌。第二，正由于中国在经济上是落后的，而建筑在这落后的经济上面的政治及其军队是腐败不堪的。这就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地用强力的方法去破坏中国旧经济的基础。

继续输进大量的鸦片毒药，以吸收中国民间的命脉——银子；压迫中国政府支出大批赔款，而使这种赔款经过赋税的方式嫁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上，使大批民众的家破产；强迫或引诱中国农民为之生产农业原料品，使他们逐步离开自己手工业的副业……这一切就是在逐步地破坏中国旧经济的基础，给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开拓市场，并使中国经济逐步地变成它们的附庸性质。

在鸦片战争中，由英国暴力所造成的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而外，又承认五口通商，使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深入内地通商的主要据点，而由这条约所改变的通商章程关于值百抽五的关税规定，且使中国失掉了关税自主的权利，使外国商品对中国经济优越压力，除了价廉物美方面之外，更有不平等条约这方面了。鸦片和棉织品的输入，银子和丝茶的输出，这些仍佔门户开放后第一个时期中国国际贸易的主要地位。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在一八五〇年代表上海外国洋行到内地收买丝茶，曾叙述了一段关于中外国贸易的状况：『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运至内地。又非

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向外国者，必先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人民肩负来风岭者，不下十万人……」（参阅：『西学东渐记』）这时离开第一次鸦片战争终结时（一八四〇——一八四二）有十七年的光景。湖南湘潭在当时还算是内地，而由这地方到广州的肩负工人已达十万人，这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确已展开了自己的市场了。诚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就在创造世界市场——至少在大体上创造世界市场，并创造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既然地球是圆的，那末移民于加里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门户开放，大概是完成了这个过程』（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致恩格斯信）。中国门户确被打开了，中国确已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市场的部分，关于这点。恩格斯远在一八四七年就有以下一段深切的描写：

『因为机器日益减低工业品的价格，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旧有手工工场制度，各处都被破坏了。一切半野蛮的国度，过去多少是离开了历史发展的，其工业向来是依靠于手工工场的，现在已迫不得已而走出闭关自守的状况，这些国度已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货，而使手工工场中的本国工人一定归于消灭。这样一来，像印度这样数十年来未曾有过什么成绩的国度，就处处起了革命，而且甚至中国现在也在走近革命。事情已弄到这个田地，就是在今天英国发明的机器，经过一年以后就会剥夺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以来，大工业就把世界各民族联系了起来，把一切小规模的地方市场统一成了一个世界市场，使文明进步普及各地，并产生了一种结果，即在文明国中所发生的现象一定要影响到其余各国。』（共产主义原理）

中国已与世界联结起来，闭关自守的中国变成世界的中国了。用『祖传』和『秘制』自高的各种陈腐不变的产业组织逐步也不能存在，一件衣服可以穿一辈子甚至几世代的大部分

家庭工业棉织品逐步地被外国大工业的棉织品所代替。自给自足的村社小天地是在逐步地破坏了。马克思论印度的时候，对于这种「小规模、半野蛮的、半文明的村社」的经济基础的破坏，曾称为『这样就实行了亚洲所从未经过的一次最大的、而且可说是唯一的社会方面的革命。』这种革命同时也就是对于暴虐的专制政体基础的破坏，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无论什么地方，从印度起到俄国止，凡是古代村社习俗还保存着的地方，这种习俗便做了数千年来最横暴的东方专制政体的基础』（反杜林论），在中国，这种经济上的变化，同样的是一种革命，而这就是百年来中国经济领域上的第一次革命。

把中国重新闭关起来，这就如那一切反动派想复古一样，是不可能的了。重新闭关中国，这是反动派的思想。然而，正因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的部分，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前面，就最需要民族的独立自主，是使中国由落后变成先进之重大的条件。中国不应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商品以榨取额外利润的简单市场，不应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农产品及其他原料的农业国，一句话，不应作它们的殖民地。中国应有自己独立大工业的发展，而克服小生产的落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来侵略的抵抗完全是正当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是如何热情地在欢迎中国人民这种英勇的革命斗争呀！

太平天国的斗争就是代表中国当时人民的斗争，太平天国在土地问题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旗帜下，却干着一种客观上合乎历史所需要的工作，在大江南北破坏了许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地主的田庄，一方面，这革命给旧封建经济制度以很大的打击；另一方面，这革命同时也是打击了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在太平革命（一八五〇）后的第三年（一八五三年）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写道：

『在中国革命最初的一个时期，我就要读者注意一件事，即中国革命大概将给大不列颠的社会经济状况以一个致

命的影响。考察其茶税现在传出这样的消息「中国人的起义正在产茶区域里扩大起来，结果伦敦市场上茶叶涨价，而在上海市场上洋布跌价。」-----据最近经广州传出来的消息说，「起义逐渐普及全国。使商业有全部消灭的危险；结果，各种布匹几乎一律跌了价而且有几种布匹跌价跌得很厉害，存货很多，并且迅速增加着-----在厦门进口货的贸易（如果几箱鸦片不补在内的话），现时几乎没有-----」（生活昂贵）

在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后，英国对华输出曾一度迅速增长，从一八四六年贸易额又下降下来，甚至整个情形是产生了这样的特点：「中国丝茶向英国的输出额日益增长，而英国布匹对华的输入额整个讲来却没有变化」（以上均参考马克思：「中英条约」第一篇）发生这样的特殊现象的原因除了中国旧经济顽强的抵抗性以外，鸦片贸易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从一八四三年起，鸦片却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一八五六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值三千五百万元，英印政府在这一年内，在鸦片贸易上得到二千五百万元的收入，即佔国家收入总额的六分之一」（马克思：「鸦片贸易」第二篇），所以，使得当时一个美国商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那种贸易应被取消，鸦片贸易呢？还是英美商品的出口贸易呢？」或者当时上海道台对一个外国人说：「只要停止向我国输入这样多的鸦片，我们就能够买你们的制造品」（以上均引自马克思：「鸦片贸易」第一篇），虽则这样，可是太平的革命运动以及南中国人民反对外人的不断斗争。终究是阻碍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市场的扩大，并且由于太平的禁止鸦片，同样的也会阻碍鸦片市场更进一步的扩大，明白这个原因，我们也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英国人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末不满意太平运动，结果直接组织了武装，帮助清朝和曾李顽固派来打败了它。中国有海关报告，是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开始的。按

照那报告的统计表，在一八六四年，中国在贸易上还是出超（当然过去鸦片贸易的大漏卮，是没有统计的），这年也正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年，从次年起就马上转到入超了。后来除开一八七二——一八七六这几年是出超的数目之外，一直被继续增长的入超所支配。这说明了：正是太平失败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已在中国巩固了自己的市场了。

容闳曾这样悲嘆（这位先生曾做过香港的律师，又曾当过上海外国洋行购货丝茶的代理人，他初见曾国藩时，本来只要建议教育计划，后来由其友人的授意，才建议设立机器厂的计划）：
「……自有欧西之汽船电器及各种机器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工业乃大受其影响，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八九。」又说：「外洋机械输入，漫经国际战争及其通商立约等事，而中国劳动界情势，乃为之一变，此不仅搞乱中国工业制度，且于将来全国之经济实业政治上，皆有莫大影响也」（「西学东渐记」），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劫掠者，陆续从海外走进中国，经营所谓「工商业」，另一方面，则成千成万的中国人，或则完全破产，或则已不能照旧生活，而被抛出农村，或到外国去，或到城市中来，成千成万的直接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脱离出来，「像鸟一样自由的许许多多的无产者，就被投到劳动市场上来了」（马克思），剥夺直接生产者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他即是：「……一方面是转变社会的生活资料与社会的生产工具为资本。另一方面是转变实际生产者成为工业劳动者，所谓原始的积累，无非是生产者与生产工具分离之历史的过程」（马克思），在中国，这样过程，一方面成为国内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企业之原始积累的创造，另一方面之成为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企业（殖民地企业）之原始积累的创造。

革命是生产力的动力。虽则太平革命是失败了，但毕竟打击了封建经济制度，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咸丰十一年（

一八六一），福州人……茶商购入英国机械，设厂制造。大获厚利，一时开办三厂」（今世实业通译下册六六页）。『上海之洪盛米号，创设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为国内最古之机器碾米厂』（同上二二页）。容闳于一八六三年替中国官僚曾国藩计划创设上海江南制造局，成为新式工业的特出者。军事工业的创办，在事实上也不能不影响与其他工业的发展。「枪砲工业之制造，必用煤铁；因而促进煤铁工业，更进而促进各种工业」（上海之机制工业八页）一般说来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国机器工业在一些工业部门已初步地或多或少有所发展。在个别部门中，外国在中国创办的新式工业还有更早的（如道光年间的黄埔船塢）。

一方面，是一步一步地变成资本主义列强特权佔有的市场。另一方面，则一步一步地从旧经济的破坏过程中生长出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样，使中国的社会一方面走向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则走向半封建化。一八九四年（即甲午战争的年份），恩格斯所写的一些话，事实上，正反映了中国这种变化的趋向的。

『对华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国家的闭关自守已不可能；铁道之敷设，蒸气机和电气之使用以及大工业之创办，即为着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已成为必要的了。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腐的社会制度，要随之而崩坏。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将不得不移往国外……』（致赵尔格信）。

『曾用这种方法（指暴力方法而言……原译者注）替英国商业所开辟并曾能引起一时兴旺的最后一个新市场，就就中国。唯其如此，英国资本家才这样坚持主张要在中国建筑铁路，但在中国建筑铁路，这就是破坏中国小农业及家庭工业的全部基础，而且在中国，就是发展本国大工业，也丝毫不会在相当程度内弥补这种害处，因此，数百万民众将处于

完全不能生活的状态」(致达尼爱松信)。

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中国的失败，在中国经济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列宁说：『在欧洲，我们可以很确定地指出新资本主义完全替代旧资本主义的时间：这就是二十世纪之初』。同时，这种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又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发展的历史的过程有下一段：『十九世纪末的高涨时期和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二年的危机时期。那时卡德尔成为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了。资本主义乃变成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历史的划分，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经济，有极大的意义，和资本主义变成帝国主义差不多同时，中国近代史，经过中日战争，才完全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状态，而这点和帝国主义经济生活是密切在一起的。正如列宁所写的：『……我们是生存于世界殖民地政策的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中，这种殖民地政策是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最新阶段」即财政资本，有异常密切的关系』(同上书，第六章)。为什么呢？因为：『商品输出，是以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的资本主义的特征，而资本输出，则是以垄断占统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要是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末，过剩的资本，就不用作提高国民生活标准，因为这样便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是要以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中去的方法，来提高利润的。在这些落后国家中利润常常很高(因为资本很少)，地价较低，工资较廉，原料又很便宜，资本输出之可能，是由于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捲入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铁道的的主要路线已在建设或开始建设，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已有保障等等……」(同上书第四章)。因为「资本主义愈发达，当原料缺乏愈觉厉害，竞争和获取世界的富源愈形紧急。因此，为获取殖民地的斗争也愈趋于你死我活的现象」(第六章)。因为：「在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方面上，财政资本有异常

伟大的势力，或者可以说是决定一切的势力，能屈服政治上完全享受独立的国家，并且在实际上已经在屈服这些国家。但是对于财政资本最「方便的」最有利于属国，显然这种失去政治独立性的附属国家和民族。在这一点上，半殖民地的国家便是标本式的「中间」形式。在世界已分割完结的财政资本时代，争夺这些半独立国家的斗争，当然是特别紧张」（同上）因为正如一个历史家的「十九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论「列强与瓜分世界」所指出的：「近年来地球上自由的土地，除中国以外，已被欧洲列强和北美合众国所佔据了」（转引自上书第六章）。这样资本主义列强从十九世纪末年掠夺中国的斗争，并开始了一个新的阶级。帝国主义们集中注意力来从事瓜分中国了。

以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为转机，帝国主义者本来是要立即把中国瓜分的，但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帝国主义间本身难以协调的矛盾，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可是，毕竟达到一种目的，就是把中国瓜分为各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作为自己独佔的市场，独佔的原料地，独佔的投资地。也即是把中国完全变成各帝国主义统治（一方面是分别统治，另一方面又是共同统治）下的真正半殖民地，在各势力范围里，有自己的租界和租借地，并各自大举从事建筑铁路的投资竞争以巩固和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经过马关条约关于外国在中国开办工厂的允许，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办工厂，掠夺煤铁及其他矿业，成为一时的风气。由于它们获得政治特权，资本的优越，加上原料的便利，劳动力的低廉，它们的企业，对于中国土著的企业便佔了优势。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这种对于中国的资本输出，同时也引出了另一种结果，就是刺激了土著企业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的：

「资本输出所到的那些落后的国家，影响到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异常加强其发展。因此，倘若这种资本的输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引起输出国家发展上的相当的停滞，

那末，它是以扩大和加紧全世界资本主义向前的发展为其代价的」（同上书第四章）。

一方面帝国主义进一步地把中国的经济变成它的附庸，另一方面，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又不可避免的和帝国主义者利益相矛盾。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无情的掠夺中国农民和死产者，另一方面却进一步把死产者集中起来，使它们和农民及一切人民联合起来为生存而斗争，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基本矛盾的特点。

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掠夺当成「中国的资本主义」，这是认贼作父，由此否认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民粹主义者否认近百年来中国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由此而对中国革命动力作出了反动的结论。可是，现实的经济状况，不但推翻了托洛茨基派的胡说，也推翻了中国民粹主义者的意见。

——录自「解放」第一二八期——